

中部地区城市居民生活质量的现状与评价 ——郑州、武汉和长沙主观生活质量比较研究

张 蕾, 郭 娜

(武汉大学 社会学系, 湖北 武汉 430072)

[作者简介] 张 蕾(1978-), 女, 河北保定人, 武汉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生, 主要从事经济社会学、生活质量研究; 郭 娜(1981-), 女, 安徽阜阳人, 武汉大学社会学系硕士生, 主要从事经济社会学、生活质量以及非政府组织与市民社会研究。

[摘 要] 除了经济水平的提高和客观物质生活的相对丰富以外, 和谐社会应当更加关注居民的主观生活质量, 理解社会发展进程在其成员中的心理反映和情感体验。郑州、武汉、长沙三个重要中部城市居民生活质量主观满意度的比较分析表明, 经济发展并非必然带来主观满意度的提高; 物质拥有与消费情况对主观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在降低; 居民在公共服务、包括公共医疗卫生服务、公共休闲设施、公共基础设施等方面, 以及公共政策, 即解决贫困问题、下岗问题政策、教育政策、环境保护政策方面的满意度较低。

[关键词] 中部城市; 主观生活质量; 比较研究

[中图分类号] C9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7320(2006)02-0265-06

一、现阶段主观生活质量研究的思想依据

生活质量研究一直以来与发展观的演进息息相关。无论是早期片面追求 GDP 增长的发展理念, 还是近年来可持续发展观念的深入人心, 乃至中国现阶段提出的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思想, 人类每一次对自身发展历程的反思与警醒, 都在生活质量研究的深化过程中留下了清晰的印记。20 世纪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 生活质量研究由西方引入中国, 并逐渐引起国内社会学、经济学和公共卫生领域学者的关注。这一方面是由于生活质量理论视野和研究体系的日臻成熟和完善, 另一方面更是适应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 不但经济发展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 人民生活物质水平不断提高, 更重要的是实现了由片面关注发展的客体, 转向以人为本、寻求可持续发展、构建和谐社会的转变。从理论上讲, 和谐社会就是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社会, 体现了一种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态势。动态平衡的和谐发展, 实际上体现了人民群众在生活水平提高的同时, 对高品质生活质量的积极诉求。尤其是在客观物质生活相对丰富的发展阶段, 关注社会成员的主观生活质量有助于理解社会发展进程在其成员中的心理反映和情感体验。主观生活质量研究是国际上通行的一种研究生活质量的模式, 盛行于美国, 也就是所谓的生活质量研究的美国模式。它将重点放在人们的主观生活感觉方面,

以个人的幸福作为研究的中心和出发点,从反映人们生活的舒适便利程度方面来解释对生活质量的主观感受,因而相对于客观指标来说具有更大的灵活性。通过对主观生活质量的相关研究可以深入分析社会成员对和谐社会发展理念的认同感,反映社会成员对各项社会政策执行情况的总体评价。

二、中部三城市主观生活质量的基本分析

随着“中部崛起”战略的提出,区域社会发展的问題再次引起了人们的思考,尤其是中部六省提出的发展城市经济圈的思路备受关注。中心城市在现代经济中起到的辐射带动作用早已毋庸置疑,以致人们往往将城市的竞争力理解为经济竞争力。在这样一种共识背后,其实暗含着一种危险的“惟经济化”倾向。而真正的中心城市应该是和谐发展的城市,人民安居乐业,生活满意度不断提高。本研究所要考察的正是以郑州、武汉和长沙为代表的中部城市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过过程中,社会成员的主观生活感受。

(一)总体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

中部三城市居民对生活质量的总体满意度是首要关注的问题,它反映了社会成员对自身生活境遇和社会发展状况的总体感觉。在调查中发现郑州、武汉和长沙三地居民对现在的生活质量总体持比较满意的态度,其中回答很满意和比较满意的分别占调查对象的 2.7%和 60.6%。在对具体城市进行分析时发现,长沙市居民回答对生活质量很满意的比例远远高于其他两个城市,达到 5.6%,而后两者分别为 1.0%和 1.5%,相对而言,武汉市居民对自身生活质量的评价较低,回答不太满意和很不满意的比列均高于郑州和长沙,累计达到 40.1%,而郑州和长沙累计分别有 28.7%、32.5%。

表 1 三城市总体生活质量满意度的比较(%)

满意度	郑州	武汉	长沙	总体百分比	总体累积百分比
很满意	1.0	1.5	5.6	2.7	2.7
比较满意	69.2	54.8	57.9	60.6	63.3
不太满意	24.2	34.0	28.9	29.1	92.4
很不满意	4.5	6.1	3.6	4.7	97.1
说不清楚	1.0	3.6	4.1	2.9	100.0
总体	100.0	100.0	100.0	100.0	

生活质量满意度作为社会成员对总体生活的感知,其影响因素是复杂多变的,因此一直以来是学者们研究关注的焦点。在中国生活质量研究的早期阶段,美国华裔学者林南曾把居民生活质量的结构分解成工作、家庭、环境、业余生活等不同层面,共选择 37 个领域满意度指标对城市居民生活质量进行研究。他和其他学者在 1985 年对天津千户问卷调查资料进行分析时,就使用满意度即主观生活质量的评价方式作为量度方式,认为决定生活总体满意度的主要是家庭生活、职业状况和生活环境这三个方面(林南等,1987)。卢淑华和韦鲁英 1992 年的研究以婚姻满意度、家务满意度、吃的满意度、交友满意度、业余生活满意度和穿的满意度为主要因素构建了影响家庭生活满意度的分析框架,得出婚姻满意度最为重要的结论(卢淑华、韦鲁英,1992)。易松国、风笑天 1995 年以武汉市千户居民家庭生活质量问卷调查资料为研究依据,探讨了城市居民家庭生活质量主、客观指标之间的结构联系。认为影响主观家庭生活满意度的主要因素是婚姻满意度、居住满意度和家庭收入(易松国、风笑天,1999)。

1. 自我评价影响因素

上述研究文献为此次调查的展开提供了思路,在考察影响城市居民生活质量总体满意度的因素中,主要选取了工作状况、家庭生活、社会交往、休闲娱乐、健康、物质拥有与消费、自我发展、公共服务与公共政策这八个方面,由被调查者做出自我评价并按重要性进行选择排序。调查发现郑州和长沙两地的居民选择健康作为首要因素的比例最大,分别有 33.0%的郑州市民和 36.0%的长沙市民将其列为影响生活质量的最重要方面;其次是工作状况,分别有 27.5%和 22.5%。而武汉市民更倾向于把工作状况摆在第一位,

选择工作状况是影响生活质量第一因素的人最多,达到 28.0%;其次才是健康,达到 27.0%。

表 2 对生活质量影响最大的方面(%)

影响因素	郑州	武汉	长沙
工作状况	27.5	28.0	22.5
家庭生活	20.0	15.0	19.5
社会交往	1.5	3.5	3.5
休闲娱乐	1.0	3.0	.5
健康	33.0	27.0	36.0
物质拥有与消费	8.5	11.0	9.0
自我发展	7.5	10.5	7.5
公共服务与公共政策	1.0	2.0	1.5

2. 其他客观影响因素

表 3 客观影响因素与总体满意度的相关检验

与总体满意度的相关检验	性别	文化程度	婚姻状况	就业状况	个人月收入	家庭月收入
郑州	——	——	——	——	* *	* *
武汉	——	* *	*	* *	* *	* *
长沙	——	——	——	——	* *	* *

说明：——表示没有相关关系。* * 和 * 表示变量与总体生活质量满意度之间存在相关关系,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其中 * *表示显著性水平为 0.01, *表示表示显著性水平为 0.05。

为了进一步分析哪些客观因素影响到居民的主观生活满意度,选择将性别、文化程度、婚姻状况、就业状况和个人月收入、家庭月收入几个方面与总体生活质量满意度进行相关分析,结果发现:在三个城市中性别与总体生活质量满意度的相关分析都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p>0.05$),即性别与总体生活质量满意度之间不存在相关关系;个人月收入和家庭月收入与总体生活质量满意度的关系似乎更为显而易见,在三个城市当中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而其他三个变量的情况则存在一定的城市差异,相比较郑州和长沙而言,武汉的情况更为特别,因为在文化程度、婚姻状况和就业状况的分析中,只有武汉的样本显示与总体生活质量满意度之间存在相关关系。

(二)郑州、武汉和长沙主观生活满意度的比较分析

在比较居民各项主观生活满意度时,采取主观赋值的方法,分别赋予“非常满意”、“比较满意”、“不太满意”、“很不满意”、“说不清楚”为 4 分、3 分、2 分、1 分和 0 分。三城市具体得分情况见表 4。

从表 4 中可以看出,被调查者对家庭生活与社会交往、物质拥有与消费、自我发展、休闲娱乐等方面的主观满意度都比较高,而对健康和公共政策的满意度最低。三城市横向比较来看,郑州的被调查者在所考察的七个方面的主观生活满意度得分是最高的。

表 4 三城市主要主观生活质量得分情况

类别	郑州	武汉	长沙
健康	2.1288	1.9519	2.0522
工作状况	2.3988	2.3229	2.3841
家庭生活与社会交往	3.6888	3.4661	3.4738
物质拥有与消费	2.6173	2.5153	2.5421
自我发展	2.9554	2.8534	2.9133
休闲娱乐	2.5862	2.3927	2.4860
公共服务	2.3558	2.0474	2.1844
公共政策	2.0437	1.8907	1.9821

1. 健康状况

个人的健康状况,以及公共医疗花费是影响健康主观生活满意度的主要因素,选取的主要指标包括个人身体及精神健康状态,以及相关公共卫生服务,包括医院的急救措施、治疗收费、药品价格、急救交通便利、医院服务等方面的满意度。在武汉市,28%的人对个人身体健康状况很满意,55.5%的人对个人身体健康状况比较满意。在对医院的治疗收费的满意度方面,76.3%的人认为不太满意或很不满意。同样,有 78.8%的人对医院药品的价格不太满意或很不满意。这种差异反映在满意度得分上,个人身体、精神健康满意度为 3.0126 分,而对相关公共卫生服务满意度的得分只有 1.5978 分。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长沙和郑州,绝大部分的人对自己的身体健康状况和精神状况很满意或比较满意,而对医院的治疗收费和药品价格不太满意或很不满意。由此可见,公共卫生状况是影响个人健康主观满意度的主要因素,过高的医疗开销会给个人和家庭带来负担。其中,医院的治疗费用及药品的价格,医院的医疗设备和条件,以及医院的治疗水平与服务等方面的公共卫生水平对主观生活质量的影响最大。

2. 工作状况

在工作状况方面,考察的方面主要包括工作环境和强度、工作收入与福利、工作中的人际关系以及工作中的发展和表现机会等。三个城市中绝大部分人对工作环境、工作强度大小、工作安全性、与上司的关系、与同事的关系、以及工作中的自主权评价都比较高。相当一部分人对工作收入、工作福利、晋升机会、激励机制以及表现自己能力的机会不太满意。在对影响主观生活质量的各种工作环境的排序中,51.8%的郑州市民认为工作收入和福利最重要,其次是工作条件和工作时间,表现自己能力的机会以及与领导、同事的关系也很重要。在长沙,35.4%的人认为工作收入和福利对主观生活质量的影响最大,而有 34.3%的人认为获得工作中的机会对主观生活质量的影响最大。武汉的情况与长沙相似,36.4%的人认为工作收入与福利对主观生活质量的影响最大;所不同的是,另有 21.2%的人认为获得工作中的机会对生活质量满意度的影响较大,这一比例低于长沙,而高于郑州。

3. 家庭及社会交往

家庭及社会交往方面主要考察的是与家人、邻居、亲戚以及朋友的关系。三城市的被调查者与家人关系的满意度都比较高(共有 76.2%的人认为与家人的关系很好)。其中,郑州居民与邻居、亲戚和朋友的关系的满意度水平要高于长沙和武汉。在影响主观生活质量的几种家庭和社会交往中的关系的排序中,相对于与邻居和领导的关系,三个中部城市的被调查者都认为,与亲人、朋友以及同事的关系是三项主要的因素。

4. 物质拥有与消费

物质生活的拥有和消费对个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比重不如人们想象的那么高,在三个城市中,只有 9.5%的人认为物质拥有与消费对生活质量的影响最大。在武汉,53.5%的被调查者对过去一年的消费状况很满意或比较满意,另有 40.5%的人对自己的消费状况不太满意或很不满意。在长沙,58.6%的人对过去一年的消费状况很满意或比较满意,31.4%的人对自己的消费状况不太满意或很不满意。相比较而言,郑州被调查者的消费满意度最高,68.5%的人对过去一年的消费状况很满意或比较满意,只有 27.5%的人对自己的消费状况不太满意或很不满意。

在对当地商店的物品、价格以及服务的评价中,91%的人对当地商店商品的丰富程度很满意或比较满意;超过一半的人对商品的质量、店员的热情程度以及商家提供的服务满意。相当一部分的人对当地商店的物价水平以及商店的“三包”政策不太满意或很不满意。在对影响主观生活质量的相关消费因素的排序中,当地的物价水平、个人消费能力、商品和服务的质量以及商家的信誉是几项主要的因素。

5. 自我发展

自我发展状况主要是指个人在生活和工作中表现出的各种能力,具体包括沟通和组织能力,以及学习能力。在郑州,85%以上的人对自己与他人的沟通能力、人际协调能力,以及组织能力感到满意;而对于获取信息的能力、学习能力以及专业知识的运用能力的满意度略低于这个比例。在长沙,被调查者对于

与他人的沟通能力以及人际协调能力满意度较高;对获取信息的能力、学习能力以及专业知识的运用能力满意度相对较低。同样在武汉,居民对组织能力、获取信息的能力、学习能力以及专业知识的运用能力的主观满意度评价低于对与他人的沟通能力和人际协调能力的评价。

6. 休闲娱乐

三城市被调查者认为,经济条件、家务负担的轻重程度、休闲时间以及本人的兴趣对休闲生活质量的主观满意度影响较大。在武汉,49.8%的人对公共娱乐设施设置状况不太满意或很不满意;而在长沙和郑州,这一比例分别只有36.6%和35.5%。在这三城市中,63.4%的人对休闲时间拥有量感到很满意或比较满意,68.1%的人对到公共娱乐场所休闲的交通便利状况感到很满意或比较满意,54.7%的人对家里的娱乐设施状况感到很满意或比较满意。武汉和长沙的被调查者对休闲时间拥有量和家里的娱乐设施状况的满意度要高于对公共娱乐设施设置状况和相应交通便利状况的满意度,而郑州恰恰相反。

7. 公共服务与公共政策

评价本市的公共服务状况的主要变量包括治安状况、“110”出警速度、公交车状况、交通秩序、城市环境、社区服务这几个方面。在郑州,被调查者对本市交通状况的评价最低,有55%的人感到不太满意或很不满意,而他们对本市治安状况的评价最高,有58.5%的人感到很满意或比较满意。在武汉,被调查者对本市公共服务状况的主观满意度普遍都较低。49%的人对本市的治安状况不太满意或很不满意,52.3%的人对本市的公交车状况不太满意或很不满意,63.8%的人对本市的交通秩序不太满意或很不满意,70.7%的人对本市的城市环境状况不太满意或很不满意,43.7%的人对社区服务状况不太满意或很不满意。在长沙,被调查者对本市公共服务状况的评价也不高。有56.3%的人对本市的治安状况不太满意或很不满意,50.5%的人对本市公交车状况不太满意或很不满意,67%的人对本市的交通状况不太满意或很不满意。总体来说,郑州和长沙的被调查者对本市公共服务的总体满意度要高于武汉。

在对我国的公共政策的评价方面,三城市的被调查者对中国的解决贫困问题政策、下岗问题政策、教育政策、以及环境保护政策方面的主观满意度评价都很低,绝大部分的被调查者对这几个方面都感到不太满意或很不满意。从表4的得分情况来看,对公共服务和公共政策的总体得分也是最低的。

三、结论与讨论

(一)经济发展与主观生活满意度

快速经济发展并不必然带来主观满意度的提高,贫困问题、收入分配不均以及环境的持续恶化等问题直接影响人们的幸福感。经济发展与主观生活满意度(或幸福感)并不必然地成正比关系,经济发展水平也不是影响居民主观生活质量的惟一决定因素。郑州、武汉和长沙都属于中部中等发展城市,从个人月收入水平看,郑州市最低,长沙高于武汉。从总体满意度水平来看,郑州市被调查者的主观满意度最高,长沙市的主观满意度也比较高,而武汉市被调查者的总体主观满意度最低。

(二)物质拥有与消费情况对主观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在降低,个人自身发展机会的影响在增强

在这三个中部城市中,被调查者对家里的娱乐设施状况的满意度较高,对与消费有关的因素,如商品丰富程度以及质量、物价水平、服务等方面的满意度较高。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在这三个中部的城市中,物质拥有与消费已经不是制约居民主观满意度的主要因素。相反,调查结果显示,三个城市中被调查者对工作中的晋升机会、激励机制以及工作中表现自己的机会的满意度普遍较低。

(三)对公共服务的要求提高,包括公共医疗卫生服务、公共休闲设施、公共基础设施等

公共医疗卫生服务水平是导致居民健康幸福感总体水平很低的一个主要原因,医院治疗费用、药品价格昂贵,使得很多家庭的患者很难及时接受治疗,或者很长一段时间背负沉重的治疗费用负担。另外,被调查者对公交车状况、交通秩序、城市环境、社区服务等城市基础设施环境方面的满意度也比较低。

(四)中部地区对公共政策的主观满意度较低

被调查者在扶贫、下岗、教育以及环境保护等方面的满意度较低,而这些同时又是中部城市在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中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作为中部重要城市,武汉、郑州、长沙在转移和吸收农村剩余人口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同时也带来了许多问题,比如,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下岗职工的再就业问题、日益恶化的环境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等。政府在解决这些问题时的措施、力度及政策倾斜将会给居民的生活质量带来直接的影响。

[参 考 文 献]

- [1] 高剑平,等. 广西城镇居民生活质量调查及心理分析[J]. 广西社会科学, 2004, (3).
- [2] 林 南,等. 生活质量的结构与指标:1985 年天津千户问卷调查资料分析[J]. 社会学研究, 1987, (6).
- [3] 卢淑华,韦鲁英. 生活质量主客观指标作用机制[J]. 中国社会科学, 1992, (1).
- [4] 易松国,风笑天. 城市居民家庭生活质量主客观指标结构探讨[J]. 学术季刊, 1999, (1).
- [5] 蒋 青. 城镇居民生活质量及其影响因素[J]. 财经科学, 2004, (1).
- [6] 中共中央党校经济学教研部课题组. 试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N]. 光明日报, 2005-03-26.
- [7] 周长城,等. 社会发展与生活质量[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1.
- [8] 郑杭生. 和谐社会与社会学 DB/OL. 中国社会学网, 2005-02-12.
- [9] Tang, Kwong-Leung. East Asian Newly Industrializing Countries: Economic Growth and Quality of Life [J].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1998. 43:69-96.

(责任编辑 于华东)

Comparative Research on Subjective Quality of Life: A Case Study from Zhengzhou, Wuhan and Changsha

ZHANG Lei, GUO Na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Hubei, China)

Biographies: ZHANG Lei (1978-), female,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Doctoral candidate, Wuhan University, majoring in economic sociology and quality of life studies. GUO Na (1981-), female, Graduate,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Wuhan University, majoring in economic sociology, quality of life studies, and the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Abstract: Besides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he richness of living assistances, the so-called well-off society ought to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subjective quality of life, reflecting its members' psychological and emotional experiences. Data based on the collection of Zhengzhou, Wuhan, and Changsha, three major cities in middle China, indicate that, economic development doesn't necessarily result in improvement of subjective quality of life. The influences of material oppression and consumption on subjective well-being (SWB) have been lowered. However, the citizens have a common lower SWB in both public services, such as medical services or infrastructure, and public policies, especially in eliminating poverty, laid-off workers, education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Key words: cities in middle China; subjective well-being (SWB); quality of life (QOL); comparative study